

主题报告：

##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中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中文藏书的故事

主讲人：

苏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亚馆馆长）

自 1602 年 11 月博德利图书馆开馆以来，中文书籍即成为馆藏的一部分。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不仅建立了博德利图书馆，并将自己的书籍和手稿悉数捐赠。在他于 1613 年去世时，馆内已收藏 49 册中文书籍。这在当时东亚以外，可谓最大规模的中文藏书。博德利爵士对这批中文书籍格外重视，将其专门存放在新馆（即现今的旧博德利图书馆）内上锁的柜子中。

首本有确切记载的中文书由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于 1604 年购入，这一年正值明朝万历四十二年。博德利爵士在书册的末页亲笔写下购藏年份及资助购书的捐赠者姓名。1603 年 4 月 5 日，博德利爵士致信馆长托马斯·詹姆斯，提到“诺森伯兰伯爵捐赠了 100 英镑给图书馆”，这笔资金很可能被用于包括这部中文书在内的多项采购。

巧合的是，1604 年适逢中国农历的龙年，而龙年在十二生肖中被认为是最吉祥的一年，象征着繁荣、智慧与好运，这也正是像博德利这样伟大的图书馆所需要的。2024 年同样是龙年，我们在去年也共同庆祝了这一年份。更具意义的是，中国农历以六十年为一个完整周期，2024 年正好是自 1604 年购入这本书以来的第七个甲子轮回，意义非凡。

有趣的是，从 1604 年那本书的图片可以看出，博德利爵士在书写时是把书倒着拿的，可见他并不懂中文，而当时在英国亦没有其他人能够阅读中文。不过，这并未阻碍图书馆在博德利爵士生前及死后持续用高昂经费收购中文书籍。

博德利爵士签名并标注日期的《四书》未必是他收藏的第一本中文书。他或许在图书馆开馆前就已获得一页 16 世纪版本的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珍稀书页。在 16 世纪末，一位身份已无从考证的英国访客拜访了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家兼图书馆馆长保卢斯·莫鲁拉（1597 – 1607 年在任）。莫鲁拉当时赠予来宾一页中文书叶，这在当时是一件极为珍贵罕见的物品。该书叶封面上的题记记录了这次相遇：“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莫鲁拉博士赠予我的一本中国书籍”。

博德利爵士鼓励有意捐赠者向图书馆捐赠书籍或资金，这些资金由他本人或馆长用于购书。所购书籍会按照捐赠者的姓名逐一登记在捐赠人名册中，并详细记录所购书目的信息。自1604年购入那本中文书后，博德利爵士又利用捐款持续为图书馆充实中文馆藏。

1607年，凯瑟琳·桑迪斯向图书馆捐赠了20英镑，其中有8卷中文书籍是用这笔捐款购置的。这批中文书在捐赠名册中以拉丁文“Octo volumina lingua Sinensi”（八卷中文书）的粗体大字记录，并被列为该页的首项，但并未提供更多关于这些书的详细信息。

凯瑟琳·桑迪斯是一位女商人，她是政治家埃德温·桑迪斯的第四任妻子。埃德温·桑迪斯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该公司于1607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了詹姆斯敦殖民地。他同时还是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并于1603年向图书馆捐赠了30本书。此外，他还参与创办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博德利图书馆首次有记载接收中文书籍是在1607年，当年共入藏36册。博德利爵士于1607年6月24日致信托马斯·詹姆斯，提及从伦敦运来的一批书籍，其中写道：“中国书籍方面，因为我无法记录书名，我就在每一册上写上捐赠者的姓名。”实际上，他确实在书上写下了捐赠者姓名，但往往拿反了书本，甚至倒写。这些书后来被重新以欧式羊皮纸装订，捐赠者姓名也依照博德利爵士的写法标注在书皮上。

在博德利爵士在世期间，曾向博德利图书馆捐款的人士包括：1606年的马修·丘布和约翰·克拉珀姆；1607年的查尔斯·丹弗斯爵士、马丁·拉姆利、凯瑟琳·桑迪斯夫人和弗朗西斯·维尔；1609年的威廉·赫伯特（彭布罗克伯爵）；1610年的弗朗西斯·克莱尔爵士和阿马郡教长欧文·伍德等。根据相关记录推算，17世纪初每册中文书约价值一英镑。

在一些情况下，同一版本的不同卷册是分几年、使用不同捐赠者的资金购入的。这可能说明书商为获取最大利润，将卷册分开单独出售，而由于博德利爵士不懂中文，未能察觉到卷册重复或分散的情况。

从主题来看，早期藏书中只有两部是儒家著作，其余都是医学类文献。这反映出明代中国的出版趋势，当时儒家经典和医学书籍是最常被商业出版并广泛流传的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1613年之前与之后入藏的中文书籍在装帧和内容题材上存在明显差异。早期的中文书大多保留了原有的中国包纸封面，或换用了欧式纸张重新装订，但仍保留原有的线装结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在西方又称“猴王”）则是稍晚时期入藏的，约在康熙年间（1670年代）。这部明代刊印的《西游记》是现存最早的插图版之一，并且采用口语化的汉语而非文言文写成。

1687 年（清康熙年间），中国学者沈福宗作为首位有记录来访英国的中国人，他的到来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沈福宗为博德利图书馆编目整理了约 170 册中文书籍，并将中文语言和文化介绍给第五任馆长托马斯·海德。1687 年夏天，两人在图书馆共度了七周，不仅整理了馆藏，还就书籍内容以及中国的文化、宗教、地理、语言、饮食甚至葡萄酒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沈福宗因此获得了 7 英镑的报酬，在当时被视为一笔丰厚的酬金。

两人的合作不仅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也促进了思想与学术的交流。托马斯·海德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兴趣贯穿其一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沈福宗是首位在牛津（乃至英国）教授中文的中国学者，而海德则成为英国最早的中文学生——尽管七周时间还不足以使他流利掌握这门语言。

两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展现出彼此的深厚敬意和对跨文化理解的共同追求。两人的相遇正体现了牛津大学包容性学术精神，这一精神超越了地域和背景，至今依然被珍视和传承。

此后，图书馆又先后于 1882 年和 1913 年收购了两批重要的中文藏书，分别为 1.7 万册和 2.7 万册，前者来自传教士兼学者伟烈亚力，后者来自汉学家汉学家埃德蒙·巴恪思爵士。

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为博德利图书馆确立了收藏、保存和开放中文书籍的悠久传统。他所购入的许多中文书，如今已成为东亚地区失传的独特孤本或极为罕见的版本。其中部分书籍现已透过数字化或重印的方式“回流”中国及华语世界。虽然不少馆藏是残缺不全的多卷本，但博德利图书馆通常是相关版本中藏卷最为齐全的收藏机构。

博德利图书馆早期收集中文书籍，正值欧洲东方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尽管当时普遍缺乏对中文的了解，博德利馆的中文藏书规模和范围已远超其他欧洲的学术机构。博德利爵士本人及早期的捐赠者，在建立这个世界知名馆藏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便于铭刻捐赠者姓名和保护书籍，图书馆早期采取软羊皮纸重装中文书籍，但此举有时会导致书籍的结构受损，也不便于中文书的正确保存与流通。因此，博德利图书馆于十九世纪初已停止采用此做法，远早于欧美其他藏书机构。

最后，博德利图书馆的早期中文藏书激发了对语言和学术方面的兴趣。沈福宗的到访及图书馆首部中文目录的编制，凸显了博德利图书馆在促进欧洲早期中国学研究中的先驱角色。这段历史为殖民主义兴起前、尚未出现权力失衡的中西学术交流，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案例，也为东西方的知识合作树立了另一种典范。